

第六章 結論

在外國學者的眼光中，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台灣文壇其實是生意盎然，妮特·浮若特（Jeannette L. Faurot）便認為：「一九六〇到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產生了一些第一流的中文小說，由於經濟的繁榮，教育之普及，產生了一個相當大的中產階級讀者群，鼓勵了各種意識型態的文學創作。作品內容及風格兼容並存。思鄉懷舊，現代派技巧，鄉土派的寫實，由不同的角度呈現一個充滿活力的台灣。」¹這種活力的展現，是台灣面對不斷的橫逆所激起的浪花。一九七〇年代以後，中華民國之所以會在國際漸漸被孤立，是個複雜的政治與歷史議題，這些外交的困境與島內的問題所形成特殊的時空背景，喚醒了某些作家的社會意識，也讓小說的書寫手法與挑戰姿態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位於一九七九年這個關鍵時刻，政治小說配合著日漸壯大的政治運動，參與了整個台灣大幅度轉變的推手工作，它挑戰人們不敢碰觸的禁忌，並讓讀者了解，文本中所記錄的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台灣不可遺忘的歷史記憶，因為「政治小說貴在給統治階級一面反省的鏡子，同時喚起被統治階級沉睡的靈魂」²。

呂正惠認為：「政治的可怕的現實，距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我們不但沒有目睹，甚至也沒有耳聞，只有傳說中的陰影，會在太平的日子突然裂開的縫隙裡出現，短暫的壟罩在我們心頭。」³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文本中，很多悲劇故事已遠離，很多內幕消息也僅止於傳聞，很多作者的遭遇也不應該再重現。楊青矗在〈選舉名冊〉中認為：「國民黨在台灣處處想做好，想盡辦法要做好，這是令人敬佩的事，不過就是抓得太緊，放不開。」⁴國民政府的德政與優點，在挑戰的年代裡隨著大敘述遭質疑與國族認同的分流中遭到稀釋，因政治而被動員出的民族意識，開始割裂個人與國家的傳統關係，作家們也趁勢競相爭奪文化場域的新發言權。到了解嚴之後，台灣社會能量的爆發讓這種趨勢越演越烈，激進的態度導致族群間不斷被污名化，進而形成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背道拉扯。對於分裂的國族認同，許多學者憂心忡忡，但邱貴芬卻認為：「我覺得不瞭解本來就

¹ 美國妮特·浮若特（Jeannette L. Faurot）教授曾主編論文集《台灣小說》，集中的文章全在一九七九年德克薩斯州立大學所舉行的台灣文學研討會上發表過。請詳參齊邦媛：《巨流河》，頁482—頁483。

² 楊耐冬：〈從《獨裁者的秋天》談政治小說〉，收入（哥）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撰，楊耐冬譯：《獨裁者的秋天》（台北：志文出版社，1989年8月再版），頁2。

³ 呂正惠：〈歷史的夢魘——試論陳映真的政治小說〉，收入呂正惠：《社會與小說》，頁194。

⁴ 楊青矗：〈選舉名冊〉，收入李喬、高天生合編：《台灣政治小說選（一）》，頁171。

是一種常態，我們要繼續去溝通，但是也要能理解不認同的存在，承認可以有不同的認同存在才是我們想要的國家，台灣的認同也正是透過這樣一個承認差異而得以成立。」⁵這種互相不瞭解的常態，普遍存在於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文本中，至於進展到承認可以有不同的認同，則成了解嚴以後政治小說所必須面對的議題。期待新世紀的政治小說能如蕭阿勤所言：「要減少這種冷漠、譏諷與敵意，以及伴隨而來的衝突、屈辱與仇恨，也許有不少方法，但其中之一至少是在適當的時候擱置工具論，認真而接納地對待他人的故事。」⁶

綜上所述，本論文的結論如下：

一、拒絕遺忘，主動對話

史畢瓦克（Gayatri Spivak）認為：「假如弱勢社群能夠發生的話，感謝主，弱勢社群已不再是弱勢社群了。」⁷從鄉土文學論戰、兩大報文學獎或白色恐怖出身的作家，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時，已成為具有發聲權的群體。如張大春、黃凡的小說已不再屢投屢退；保釣分子劉大任、郭松棻與李渝的小說引人注目；李昂、林雙不、宋澤萊、王幼華、東方白、楊照、拓跋斯·塔瑪匹瑪等人也盤據文學史重要角落；施明正、陳映真、王拓、楊青矗、姚嘉文等人更以政治犯身分寫出一篇篇讓人驚奇的故事；鍾肇政、吳錦發、李喬、葉石濤、李昂、林雙不、宋澤萊等人也擁有報章雜誌與小說選集的主編權力。於是他們不再緘默，紛紛以政治事件、建構歷史與人權故事為素材，引導群眾去了解已被遺忘或塵封的社會記憶，並提供群眾所需要的啓蒙管道，讓整個政治禁忌毫不保留的呈現出來。這種書寫是一種拒絕遺忘歷史的方式，不但召喚了已棄置在角落的歷史記憶，也形塑著多元的族群意識，更質疑了官方說法的合法性，形成與執政當局強勢對話的論述方式。便如同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所言：「我不會倒退半步——我要讓我的聲音被聽到。」⁸

二、反映現實，自我詮釋

⁵ 邱貴芬：〈身分與認同：講評〉，收入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編：《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年3月初版），頁313。

⁶ 蕭阿勤：〈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第5期（2003年7月），頁244。

⁷ 引自余麗文：〈香港的故事：也斯的後殖民話語〉，收入黎活仁、龔鵬程編：《香港新詩的大敘述精神》，頁184。

⁸ 引自（美）貝克（Daniel B. Baker），王文斌等譯：《權利語錄》，頁120。

陳芳明認為：「自我放逐的精神，恐怕是台灣戰後文化的一種特殊性格吧。漂泊於天涯海角者，可以是為一種外部流亡；留在島上的自我放逐者，則可說是屬於一種內部流亡。」⁹這種觀念與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觀察如出一轍。¹⁰之所以會產生外部與內部的流亡，很大的部分來自於政治上的禁制、恐懼與不滿，郭松棻、施明正與林雙不的小說就是這些類型的代表。這種恐懼與不滿的透射，是一種危機，也是一種轉機，因為到了美麗島事件之後，恐懼與不滿便成為創作的資產，也讓國民政府有了轉型改革的基本共識。¹¹不論是年輕的創作者或坐過牢的作家，不是透過政治小說的諷刺、批判與寓言反映百年來的台灣現實狀況，就是藉由歷史的建構揭開被大敘述遮掩的先民血淚故事和對這塊土地的愛戀，或許他們的書寫與詮釋無法保持全然客觀的立場，卻也帶給台灣文壇全新的活力與全新的定位。

三、放大身影，追尋真相

若說現代主義派小說，是一部知識系譜的展示；那麼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就是一場政治事件與認同立場的論辯。要提升自己論辯的能見度，除了題型內容的特殊之外，也可以藉由放大自己的身影，讓當權者注意，讓媒體與群眾聚焦到這上頭。當政治小說的主角身影被放大時，裡面所呈現的罪惡與苦難也跟著被放大，再串連一篇又一篇的情節，便拼湊出政治事件的真相：當權者的壓迫嘴臉與受迫者的苦難風貌。但是這些書寫集體焦慮或社會記憶的焦點，若持續無限的放大，自然而然會形成失真或失焦的狀態，所以鄭清文認為：「政治小說的共有缺點，就是作者過分主觀，寫人用事，都過分誇大，善惡和是非的界線，也過分鮮明。」¹²批判或諷刺政治是很簡單，要一一描繪現實政治的複雜層面或政治事件的歷史層面卻非常困難，往往會陷入族群界限的問題與意識形態的偏執，而

⁹ 陳芳明：〈撰寫碑文的心情〉，收入陳芳明：《陳芳明精選集》，頁167。

¹⁰ 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認為：「幾乎是自從有作家以來，就開始有被流放的作家。有時他們是作為人民大眾乃至整個民族的喉舌，而從自己的土地上被流放。」請詳參（美）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劉玉宇譯：《途中的鏡子：文學與現實世界》，頁124。

¹¹ 戎撫天認為：「事實上，國民黨當時的威權力量，是可以摧毀任何反對團體的。可是他不敢殺黨外，就是整個社會，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這樣的媒體都有共識。蔣經國決定解除戒嚴的基本原因，就是因為社會推動民主已有共識。」請詳參戎撫天：〈曲筆奮進迎向新時代〉，收入何榮幸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頁314。

¹² 引自彭碧玉、丘彥明、吳繼文紀錄：〈歷史的胸懷 文學的證言：聯合報第五屆小說獎中長篇小說總評會議紀錄〉，《聯合報》（1980年11月12日）14版。

過分誇大局部的書寫，產生失真、失焦的缺陷，林雙不、黃凡、陳映真等優異的小說家都無法避免這些問題，其餘的政治小說也就更難避免了。

四、淘洗作用，重新審判

是這樣的時代背景，改變了許多知識分子的人格信仰；也是這樣的政治體制，造就了作家批判與反抗的意志。就當權者的角度而言，保護國民安全與延長政黨執政生命是他們的義務，所以當權者執行強制性權威與誘導性權威是正常的現象；異議分子或政治思想犯的被淘洗、被刑求、被監禁或被殺害，也是不容忽視的迫害現象，因為沒有比誣陷公民、迫害人民更令人忿怒的事。在「所有與群眾運動有關的字眼都令人興起政治恐懼」的年代，¹³政治小說的作家以各種角度探求敏感的政治事件或人權狀況，他們用文字颯破禁忌，也用書寫將逝去的時代凍結在文本中，再藉由每一次的閱讀曝光，讓讀者重新審視與判決這些政治或人權事件。其實「許多所謂的權威，其實只不過是一紙偽裝出來的假象，一被撕開，就再也無法維繫」，¹⁴經過這些符號的衝撞，就算無法造成一勞永逸的烏托邦國度，卻也讓文本中的故事，達到解放的目的。

五、尋找中國，發現台灣

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文本已將關注的焦點由內在的焦慮轉向外在的行動，並安置族群意識對時代的期望和抱負。李渡予曾說：「未來這個島上，不管誰將掌握權力、誰可以改變語言文字的涵義、誰將控制集體的記憶，只要有人仍焦慮某些存在過的現實，因為沒有名字而將為人們淡忘，只要有人不甘心歷史的複雜真相，淪落到和電視裡某種化妝品廣告同等分量，那麼一種比較接近人性的紀錄，就會繼續被寫下去。」¹⁵藉由政治作家的文本召喚或母語召喚，讀者們不但了解或記起已遺忘的族群經驗，進而大膽想像自我身世與歷史背景。所以，在張大春、張系國、陳映真、陳若曦的筆下，不斷尋找的是中國的新座標；在李喬、

¹³ 鄭至慧：〈從沒有單位到集體發聲〉，收入楊澤主編：《狂飆八〇——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初版一刷），頁62。

¹⁴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收入楊澤主編：《狂飆八〇——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頁28。

¹⁵ 李渡予：〈得獎感言：只要有人……〉，收入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十三屆小說獎暨附設新詩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6月初版二刷），頁40。

宋澤萊、拓拔斯·塔瑪匹瑪、王拓的筆下，重新發現的是台灣的新身分。這兩種中國的新座標或台灣的新身分會相互排斥頡頏，但也會有彼此融合相繫的時刻，若能去異存同，承認對方是不可失去的一部份，便會如陳芳明所言：「文學不是要我們建立偏見，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化除偏見。」¹⁶



¹⁶ 陳芳明：〈台灣文學史的建立和歷史發展〉，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史十一講》（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年12月初版），頁180。